

绪 论

没有不用谋的战争。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敌对双方凭借既定的物质条件而进行的智力竞赛史，就是一部千姿百态的军事谋略斗争史。无论在东方、在西方、在世界战争史中，到处都闪烁着军事谋略艺术这一人类智慧的光彩。而且，这种艺术在东方兵学中更加璀璨夺目。

中华民族长于思辨，精于筹谋。注重谋略是东方兵学的显著特征。在悠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兵家辈出，涌现出无数风流人物，创造了无数垂范千古的军事谋略杰作。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兵法著作中，处处可见前人施计用谋的经验。当人们看到《孙子兵法》在海外广泛流传，受到外国军事将领无限敬慕，看到在当代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军官兵每人手持一本《孙子兵法》研究战争中如何施计用谋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拥有军事谋略艺术这一中华民族优秀军事遗产而备感自豪。其实，更值得中华民族自豪和骄傲的，是把中国传统军事谋略艺术推向崭新阶段的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

一、中国军事理论的瑰宝

谋略，也叫权谋。它作为人类智慧的象征，可溯源到远古时代，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在军事领域中出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集中反映“斗智”的谋略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把那些诡诈、用间、造势、示形等各种施计用谋的方法和手段经过高度抽象概括而成的。“谋”与“略”二字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同一概念

同时联在一起使用的。而是“谋”在先，“略”在后。“谋”这个概念，最早见于4000多年前的《书经·大禹谟》：“询谋合同（指君臣共同商议确定计谋）”，“弗询之谋勿庸”（意思是未征求意见的计谋不能用）。赋予“谋”以丰富含义并加以系统阐述和运用的，首推孙武。

《孙子》以“计”开篇，全书贯穿了一个“谋”字，书中讲的“计”、“智”、“权”、“庙”、“策”等等，都体现了“谋”的含义。当然也不止《孙子》赋予“谋”以丰富含义，《六韬》中的“韬”，《吴子》中的“图”，《司马》中的“急”，都可以说是“谋”的别称。所以，《说文大字典》中注，“谋”即“计也议也图也汉也”。

将“谋”与“略”连用的提法首见于《六韬》。书中写道：“无智见权谋”，这实际已是把“谋”与“略”连在一起使用了。“谋略”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使用，最早见于我国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魏书·明帝记》。曹魏的官员何曾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上表称：“宜选大臣名将”；“遣诣懿军，进同谋思，退为辅佐”。其意是说，应选大臣名将，派遣到司马懿军中，战时共同商定谋略，平时任副职。至此，“谋”与“略”经历春秋战国的先秦和秦汉两个时期，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谋略”概念。此后，“谋略”作为军事科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不断涌现于军事家之口，常见于军事家的论著之中。从“谋略”概念的形成可以看到，“谋略”的历史源头在中国，反映了重权谋的东方兵学特点。而在西方，军事谋略这一概念的出现已是15世纪的事了。

什么是军事谋略？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无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军事谋略学的研究权威李炳彦对其定义为：“在军事对抗活动中（包括潜阶段与显阶段），寻求克敌制胜之计谋方略的思维过程和结果。”比较有关的定义，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是比较科学的。它深刻地阐明了军事谋略是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

从军事谋略的形成来说，它是决策者的一个决策活动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对抗的实际运筹谋划（思维）的阶段，即“谋”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决策阶段，即“略”的阶段。所谓“略”，就是经过谋划而产生的奇计良策的概念。

从军事谋略的本质来说，它是军事领域中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属于战争指导范畴，属于横向综合性方法论。因此，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性。同样一个谋略思想，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暗渡陈仓等，既适用于战略、战役，又适用于战术。在战略、战役、战术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谋略思想进行具体的规划与设计。所以说，军事谋略的研究，最根本的就在于掌握方法，开拓思维，善于创造，指导实践。

我国的军事谋略思想源远流长，它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黄培义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纵观中国军事谋略思想发展的历史，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夏初至西周，是军事谋略思想形成的时期，其标志是《军政》、《军志》、《令典》等兵书和《易经》。

第二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军事谋略思想发展的兴盛时期，其标志是《孙子兵法》。

第三个阶段，从秦汉至清末，是军事谋略思想曲折、缓慢发展的时期，标志是以《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为代表的一系列权谋兵书典籍。

第四个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现在，是军事谋略思想发展的崭新阶段，标志是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军事谋略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发展，但是概括起来，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兵之要 先谋为本

中国军事谋略认为，战争是各国家、民族或集团之间为了达成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争斗，是敌我双方智慧的较量，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就要对战争进行周密的筹划，就要谋求以最佳方法指导战争，这就是谋略。中国历代军事家都强调谋略对夺取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先计后战”；“谋定而后动”；“用兵之要 先谋为本”；“兵欲胜敌 谋贵素定 而战胜可必”；“以计代战 一当万”等都是对谋略重要性的深刻揭示。为了正确地施谋定策，中国军事谋略要求：必须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料敌定谋，使所定谋略与不断变化的敌情相符合；必

须谋大局，定大略，即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对策，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必须善于伐交，通过外交活动，结成自己的同盟，破坏敌方的同盟，强己弱敌，达到取胜于敌的目的；必须重视用间，使用间谍打入敌方营垒适时获取敌方情报，利用矛盾从敌方内部攻破敌营垒；必须集众思、聚广义，做到谋必参诸群士；必须坚持上兵伐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争“全胜”为最高理想；必须明确谋成于密，败于泄，严格保守谋略机密。

（二）先胜而后求战

中国军事谋略认为，战争是各种制胜因素的较量，这些因素必须在临战前充分准备，才有胜利的可能。中国历代军事家都强调必须在战前充分了解敌人情况的基础上，做好应敌的各项准备，再去和敌人交战。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先胜而后求战”，先有了胜利的把握再去和敌人交锋。为了实现先胜而后求战，中国军事谋略要求：必须做到先为不可胜，立足最坏的情况，从政治、经济、军事、武器装备、士气、谋略等多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为争取最好结局创造条件；必须做到胸有成算，在战前通过充分测算，订出周密计划，包括基本方案、基本计划和各种预备方案、计划，然后再出战；必须预测必然，测知胜负，即通过先知预测，了解敌我情况，发现敌之优点和我之不足，有针对性地对付敌之长处，克服我之不足，或测知不胜则不战；必须谋形造势，创造先胜态势，即从得天之利、得地之利、得敌之情、得士之心、得事之机等诸方面创造战胜敌人的有利态势。

（三）致人而不致于人

中国军事谋略认为，在战争指导上，争取主动权至为重要。孙子提出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明确指出，用兵之道重在能调动、左右和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左右和控制。尉缭子说，作为将领，就应该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这也是要求必须在天时、地理、对敌斗争中都要争取主动地位。为了争取主动，历代军事谋略家提出的主要原则包括：要先处战地，即首先占领有利的地势；先发制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首先发起进攻，充分发挥自己的锐气，去赢得主动，战胜敌人；后发制人，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先

让一步，把敌人的锐气消磨到最低程度，而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最高程度，再发起进攻战胜敌人；以迂为直，在条件不许可，或途中有险阻，或直进遇强敌时，都需要采取迂回手段，这样看起来走了弯路、费了时间，实际上有利于达成战争目的；扬长避短，注意发扬自己的优势，克服自己的不足，如《太白阴经》所说：“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所长，蔽己所短”；以利致敌，利用敌人追利逐胜而战的心理，以利引诱它，可以调动敌人，陷其于被动之中；攻其必救，不直接进攻当面之敌，而是转而去攻打敌必救的要城要地，迫敌出来救援，借机歼灭其于运动之中。

（四）因机立胜

中国军事谋略认为，所谓因机立胜，是指要根据战争情况多变的客观实际，制定和运用主观指导原则，按照不断变化的情况，适时地捕捉战机，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法。孙子所说“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岳飞所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都是说明战争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态和模式，战争指导者只有因形用权，随机应变，方能胜敌。为此要善择战机，因机制敌，特别要善于掌握事机、势机、情机，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空隙；要活用奇正，避实击虚，做到临敌应变、奇正相生，众寡分合、活用奇正，善察敌情、避实击虚；要出于法而不拘泥于法，做到根据不同敌人、不同战场情况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采取不同的指导方略，并根据敌情、战场情况的变化随时随地地变换战法。

（五）兵之情主速和持久以待其衰

进攻速胜是古今中外兵家和一切战争指导者共同遵守的法则。中国军事谋略认为：“兵贵速胜，久则钝兵挫，屈力殫货，速不及虑，迟则生变”，只有速才能抓住战机。明确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为了达到速胜，中国军事谋略主张：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乘敌不戒备或戒备不严之机突然发起进攻，使敌在猝不及防中败北；要选准攻击目标，即选择动摇不定或立足未稳而又实力虚弱之敌迅猛攻击，速战速决。

尽管战争指导者都希望速决，但并非一切战争都可以速决。因

此，中国军事谋略认为，在敌强我弱不能达到速胜的情况下，就应当考虑持久，通过持久以待其衰，使敌由强变弱，通过持久“蓄盈”，壮大自己的力量。实行持久战，必须做好充分的应敌准备，做到粮草足、军士练、城池坚、器械利、民心固、赏罚明、险可恃、有强援、将善谋、守具足；必须有很大的毅力和耐性，坚以待敌，不为所怒，不论敌人如何“逼我欲求一战，我则坚以待之”，在坚持中求得胜利。

（六）激人之心 励士之气

中国军事谋略不仅重视战争的物质力量，而且重视战争的精神力量，强调军心士气包括战斗意志、牺牲精神以及对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对战争的胜利有着巨大的作用。历代军事家关于“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都说明激士励气的重要性。为了治心治气，中国军事谋略历来主张：要教之以礼，励之以义，通过政治教育使士卒与国君一心，与国家利益一致，与官长同生共死，通过荣辱教育，使士卒以进死为荣，以退生为辱，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而勇敢战斗；要以战励战，以赏励赏，以士励士，通过表扬奖赏，用有战功的鼓励无战功的，用受奖赏的鼓励没有受奖赏的，使人人争功争赏，努力杀敌立功；要善于激怒士卒，通过晓之以义，激起士卒的民族感、爱国心、忠君心和对敌人的仇恨；要谨养勿劳，并气积力，使军队的士气在各种条件下都得到保持，做到士气常鼓不衰。

中国军事谋略的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受到历代军事家的推崇，被历代战争指导者成功运用。后来，通过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近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军事理论界公认的优秀军事文化遗产。

二、中国军事谋略思想的奇葩

翻开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军事理论在毛泽东之前的数千年间无质的变化。虽然兵家辈出，兵书卷帙浩繁，尽管也不乏见解独到者，但其理论思想、谋略原则以及用谋之法多是陈

陈相因。只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问世才真正使中国的军事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用于指导军事理论的创造，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发现、也无法发现的战争指导规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宝贵、最富有民族气派和特色的就是他的军事谋略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同创造的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深刻、运用之绝妙、成功之巨大，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所无法比拟的。

翻开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这一军事对抗的突出特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弱小的红军”对付“强大的敌人”；抗日战争开始，是仅有四五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对付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开始，是 120 万“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对付 430 万“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又是劣势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付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到牙齿的十六国联合军队。任何人看到这种力量相比极为悬殊的军事对抗，都不禁会问：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从“上山”到“进城”又何以能指挥人民军队以劣胜优、连克强敌？难道敌人都是打仗无术、用兵无法的草包吗？显然不是。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的强大、凶恶和狡猾的。就长期与我军作战的对手国民党军队来看，其众多将领中就不乏出色的军事人才，其统帅人物蒋介石也可谓是 20 世纪中国的军事高手，他在《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训词中提出的“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以迂为直”等所谓“剿共 10 条战略”，就颇得中国古代兵法的真谛，非等闲之辈之所能。为什么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中显赫一时的蒋介石，在与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作战中，却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调动，经常给人民军队当运输大队长，屡屡败于毛泽东手中呢？这里当然首先是因为战争性质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也有经济、军事实力和自然条件问题。但是，在敌对双方的对抗中，仅凭战争的正义性和物质条件，是不能保证胜券在握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即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

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军事谋略艺术就是主观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稳操胜券，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他掌握了高敌一筹的军事谋略艺术！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军事对抗中运用计谋与方略的思维规律的理论。它是中国革命战争以巧制胜，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以“中国革命战争军事对抗中运用计谋与方略的思维规律”为研究对象，科学地处理了它与一般军事谋略学、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关系。第一，它区别于一般的军事谋略学。军事谋略学是“关于军事对抗活动中，形成相应对策方略及随机变化的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一切军事对抗活动中形成相应对策及随机变化的一般思维规律为其研究对象。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研究的是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对抗中运筹计谋方略的思维规律。它更深刻、更集中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军事对抗活动中应遵循的运筹计谋方略的思维规律。可见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研究的范围比一般军事谋略学要小一些。它与军事谋略学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第二，它区别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关于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以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与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研究对象相比，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的范畴要宽得多。当然，二者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第三，它区别于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在人民

群众支持和配合下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它研究的对象是“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而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革命战争中“运筹计谋方略的思维规律”。当然，二者的联系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不仅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许多内容包含着毛泽东的军事谋略，而且其运筹和实施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体现了谋略性特征。第四，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或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整体，其中包括了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不仅见诸于他的军事著作中，而且大量地见诸于尚未整理成书的军事斗争的实践中。他一生指挥那么多重大战役，可以说每个战役都是大放异彩的军事谋略之花，令人赞叹不已。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军事智慧，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强烈的实践性和广泛的适用性。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吸取了许多有军事谋略造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谋略思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谋略思想和实践，在我军军事谋略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研究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时，也应当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谋略思想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战争军事谋略的集大成者。他的军事谋略创造涉及整个军事领域，遍及军事活动对抗的全过程，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以迂为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胜策；师出有名，得道多助；后发制人，以弱胜强；谋势造势，创造有利态势；着眼民众，寻求力量根源；歼敌为主，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巧用诡道，把敌人抛入劣势与被动；注重攻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打谈配合，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建立秘密战线，配合武装斗争；取之于敌，人力物力来源在前

线；灵活用兵，得心应手指挥千军万马；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可概括以下十个方面：

（一）以迂为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胜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下，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运筹中国革命战争宏谋大略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他在实践中运用“以迂为直”这一中国传统军事谋略原则，巧妙地解决了选择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课题。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要胜利，必须夺取敌人控制的全部国土空间和整个国家政权。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我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在国土空间中，敌人的重点是控制中心城市，使城市成为反动统治的中心。毫无疑问，夺取国土空间和国家政权的重点应当是夺取城市。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既无力量首先夺取它，也不可能首先在城市立足生根。因此，夺取革命胜利只能首先夺取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乡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曲折的路。走这条道路，有利于弱小的革命军队的生存、发展和积蓄力量，有利于破坏敌人统治的基础，有利于锻炼我党管理国土空间和掌握政权的能力，有利于最终夺取城市并加快夺取革命胜利的进程。围绕以迂为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与实施，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宏谋大略。

（二）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谋略

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早在我国古代战争实践中就已产生，并为许多聪明的军事家所成功运用。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对后发制人有不少的论述。近现代军事理论把后发制人的谋略发展为积极防御思想。毛泽东在前人基础上，把积极防御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宏谋大略加以创造性运用。首先是从军事和政治的有机结合上，他把积极防御与革命战争的正义性联结起来进行谋划，使之能动地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纲领。其次是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上，他把积极防御放到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进行谋划，使之成为贯彻战争始终的彻底歼灭敌人的宏谋大略。再次是从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上，他把积极防御与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结合

起来进行谋划，使之成为能动地实现以弱胜强的高超指挥艺术。使后发制人，积极防御的谋略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高度。

（三）谋势造势，创造有利态势的谋略

军事谋略强调造势，甚至把造势放到谋之根本、始计大法的重要地位。所谓造势，就是战争指导者在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和战区政治、经济、地理等现实条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充分利用有利的时机，积极谋求和占据那些能增强自身能量的空间位置，主动创造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场环境和态势。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极为重视造势。他善于审时度势地谋势造势，使开始时力量弱小的我军，能占据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并最终在战略上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彻底战胜敌人。毛泽东的造势谋略主要包括：造“先为不可胜”之势；造战略重心转移之势；造“犬牙交错”的战争奇观之势；造“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之势；造战役战斗我优敌劣之势；造全局协调之势等。

（四）着眼民众，寻求力量根源的谋略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家、军事家为了指导战争取得胜利，都在运筹使自己力量增强的谋略，寻求进行战争的力量根源。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科学分析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谋略思想：一是谋力于民，把民众作为胜利之本。毛泽东在谋划战争力量时，揭示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从而在中国军事谋略史上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战争力量的根源问题。二是谋利于民，不断激励民众的献身精神。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使之投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毛泽东既注重通过政治教育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又注重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使广大群众从内心里真正支持革命战争。三是谋民于战，发挥整体威力。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恰当地组织和运用于革命战争之中，毛泽东提出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以武装斗争为主并

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斗争形式相配合的组织斗争形式。

（五）歼敌为主，不计一城一地得失的谋略

以歼灭敌人为主的思想，在古今中外战史中多有体现，但是把实现战争的根本途径具体概括为“歼灭战”，并以此作为谋划战场作战的根本指导原则，则是毛泽东首创的。然而，在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与保守城市及地方常常发生矛盾。往往是要保守地方，就很难集中力量歼灭敌人；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又难于保守城市及地方。为了正确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正确谋略。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和“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等一系列具体谋略原则。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并不是不要保守地方，恰恰相反，凡是有能力保守、夺取的地方还是应当积极地保守、夺取，但保守或夺取地方仍然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基本着眼点的。

（六）巧用诡道，把敌人抛入劣势和被动的谋略

善用诡道，是我国军事谋略的一个突出特征。历代军事谋略家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兵者，诡道也”和“兵以诈立”的重要性，而且在战争实践中创造了诸如“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等千古不朽的诈谋奇计。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反映战争规律的军事谋略原则。一是通过旗帜鲜明地批判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充分肯定在革命战争中运用诡道谋略，对敌人施用权谋诡诈、欺骗利诱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是把运用诡道谋略作为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以劣胜优难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强调“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三是强调依靠民众运用诡道谋略，使诡道谋略成为人民战争的重要方略；四是创造了一系列巧于示形，有计划地调动敌人的谋略。

（七）打政治军事仗，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谋略

军政两手结合并用，相辅相成，历来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

一。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军事谋略家，更是注重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紧密配合。首先，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注重发挥正义战争的政治优势，善于揭示战争目的的正义性，提出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动员口号，高举正义之师的大旗，使历次革命战争始终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其次，毛泽东注重攻心战的运用，创造了诸如多方宣传，晓以利害；政策感召，指明前程；情感渲染，促其醒悟；利用矛盾，离间攻心；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谋略，对敌军“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再次，毛泽东把军事斗争与外交谈判相结合，运筹出一系列以打对打，以谈对谈，又打又谈，针锋相对的奇谋妙计，既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又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

（八）建立隐蔽战线，配合武装斗争的谋略

使用间谍进行隐蔽斗争，是中外传统军事谋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传统军事谋略的“用间”原则，把反间、防间、情报工作、秘密工作统归为隐蔽战线，积极而谨慎地建立隐蔽战线，使之紧密配合武装斗争，成为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导隐蔽战线斗争的谋略主要包括：组织力量长期埋伏敌营，搜集敌方情报；隐蔽积蓄力量，从事兵运斗争；开辟“第二条战线”，配合武装斗争。这些谋略的成功运用，使我军及时掌握敌军动向，为各级领导机关制定正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促使大批敌军官兵起义投诚，加速了敌军的瓦解；使敌人的战略后方变成反对敌人的重要战场，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九）取之于敌，人力物力来源主要在前线的谋略

经济条件是战争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对于处于敌强我弱战略态势和经济条件极为困难并在边远农村环境中的我军来说，如何搞好后勤保障，以保证人民军队的生存、发展与战胜敌人之需，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地谋划，提出了取之于敌，主要向敌军要补充；在正义战争的基础上，通过广泛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依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支持革命战争；组织群众支前大军，确保战争之需等重要谋略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十）灵活用兵，得心应手指挥千军万马的谋略

高超的统率艺术，是历代军事家所追求的最高军事指挥境界。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的统帅地位奋斗了近半个世纪，打了那么多胜仗，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从军事谋略的角度看，毛泽东得心应手地指挥千军万马，不是靠“愚兵政策”和“高压手段”，也不是靠施用权术，而是靠我党正确的战争指导方略服众，靠先进的革命理论聚众，靠优秀的将帅领兵。他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因己用兵，善于择军选将打胜仗。

四、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显著特征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与中国传统军事谋略艺术相比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战场之广阔、规模之巨大、时间之长久、对手之狡诈、斗争之复杂、战绩之辉煌为古今中外所罕见，这样的军事斗争实践必然促进军事谋略艺术获得极大发展；更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军事谋略艺术的精华，具有极其高超的军事谋略水平。因而，使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具有许多十分鲜明的特征。

一是毛泽东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研究、运用、发展中国传统军事谋略艺术，排除其中夹杂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糟粕，使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成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的军事谋略理论。

二是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目的，研究、运用、发展中国传统军事谋略艺术，排除其为剥削阶级和非正义战争服务的宗旨，使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成为为无产阶级政治和革命战争服务的、革命的军事谋略理论。

三是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研究、运用、发展中国传统军事谋略艺术，排除其中唯心史观的思想糟粕，把人民群众作为军事谋略运用的主体，使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成为人民大众的军事谋

略理论。

四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客观实际出发，把如何解决以劣势装备的弱小革命力量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作为研究、运用、发展中国传统军事谋略艺术的中心课题，使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成为以劣势胜优的军事谋略理论。

五是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需要，依靠集体智慧进行谋略创造，使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成为源于革命战争实践，又被革命战争实践所反复检验，集革命战争经验和集体智慧之大成的军事谋略理论。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之所以能在军事谋略理论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并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不像历史上有些军事家那样，脱离战争的实践，从人类战争史料中概括出一般原则，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指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精彩、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部分。它所揭示的军事谋略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原则，对我军的对敌斗争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五、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历史地位

认识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历史地位，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军事理论瑰宝的认识。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理论价值。大家知道，如何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运用劣势装备的弱小革命力量，去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进而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始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面前必须回答的极端困难的革命课题。这个课题，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所未曾遇到过的。列宁曾这样形容这一难题：我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

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家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毫无疑问，解决这个革命课题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需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时，也需要寻求正确的战胜策，运用高超的军事谋略艺术，力求以巧制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利益。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不仅历代军事谋略著作中找不到，而且“无论在哪一本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解决这个极其困难的革命课题，需要进行伟大的理论创造，也需要进行伟大的谋略创造。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肩上。他们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为借鉴，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谋前人之所未谋，又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善谋前人之所未谋；不仅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从军事谋略的高度，谋划了正确的战胜策，运筹了一系列决胜千里的宏谋大略，终于形成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实践意义。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所起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第一，它为中国革命战争运筹了通向胜利的坦途，大大缩短了革命战争胜利的进程，大大减少了为革命战争胜利所付出的代价。第二，它指导我党我军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暗礁，把握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机遇。第三，它使我党我军找到了力量的根源，由于军队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条件，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它为我军运筹了一系列转劣为优、以劣胜优的锦囊妙计，通过巧妙造势、用诈，使我军力量得到增值，而使敌人陷入困境。总之，正如叶剑英元帅指出的：毛主席用兵如神，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但得心应手地指挥我千军万马，而且迫使敌人不得不听从调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主动，在危急关头都能化险为夷。

六、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运筹方法

学习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最主要的是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运筹方法。通过深入研究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可以认为，毛泽东军事谋略运筹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知己知彼，趋利避害

正确的军事谋略只能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是谋略成败的关键。因此，毛泽东历来强调谋略运筹和运用，必须坚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一是知己知彼，求实求是。

古今往来，高明的军事家在谋略运筹中，无不力求做到“知己知彼”，毛泽东把《孙子》的“知己知彼”这一指导战争的至理名言称之为“乃是不变的真理”。翻开前人的谋略库，可以看到，任何正确的军事谋略，都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谋略。而使主客观相统一的根本方法，就是知己知彼，求实求是。即毛泽东所指出的：“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一方法包括从认识客观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到使认识成为现实的整个过程。

首先，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曾指出，在战争中，“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所谓知己知彼，所谓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它们同一意义。知彼，是对敌方各方面的情况要熟悉又要有深刻的认识；知己，则是对己方各方面情况要熟悉又要有深刻的认识。可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它具有特定的认识对象和丰富的认识内容。就认识对象而言，包括敌方和我方；就认识内容而言，包括敌我双方与战争有关的各方面情况。从宏观上说，主要指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地理等内容——是战争指导者要认识的战争全局的客观实际。从具体（战役、战术）上说，则主要指任务、我情、敌